

共和国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多个春秋，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社会发生了巨变。但共和国没有忘记，没有忘记那段最初的光辉岁月，没有忘记那一代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亿万人民曾经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时过多年，特别是每逢重大的历史关头，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话题还会一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争论。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史上没有哪一个宏观理论和实践问题，像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那样，引起人们的共鸣、争论、思考和困惑，并与现实紧密相连。

共和国不会忘记：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历史和启示



九江学院图书馆



1474669

1485974

共和国不会忘记：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历史和启示

王东 著

不外借

D696/21664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不会忘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和启示/
王东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6

ISBN 978 - 7 - 5473 - 0343 - 6

I. ①共… II. ①王… III. ①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D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783 号

共和国不会忘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和启示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258 千字

印 张：18.5 插页 2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343 - 6

定 价：36.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完善	2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的理论	20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概念的提出	20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	2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创立和完善	25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萌芽和完善	25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27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特色和合理性	39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	47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47
一、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 实践	47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 实践	49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	

实践	5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巩固	56
一、《共同纲领》的颁布	59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大运动”	62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特点	109
第一节 根据新中国的实际,正确处置旧的国家机器	109
一、区别对待国民党的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	109
二、对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律“包下来”	111
三、改造和利用旧的军政人员	112
四、要注意保护城市和有秩序地接收城市	115
第二节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117
第三节 建立精干的国家机构与树立清廉的政风	124
第四节 重视民主建设和注意党政分工	129
第五节 《共同纲领》和政治体制都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136
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代替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	136
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有过渡性	137
三、干部管理体制上的临时性	138
四、司法监督体制具有过渡性	140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144
第一节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144
一、开天辟地的一代	144
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	150
三、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58
第二节 执政党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党员的素质	165
一、注重党员的成分	165
二、整风运动	169

三、“三反”运动	171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	181
第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	182
第二节 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
一、第一次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187
二、第二次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191
第三节 消除资本家的历史痼疾	193
一、“五反”运动	193
二、“五反”运动的历史教训	202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206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共参国政、长期合作的 党派关系	206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 经济格局	213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导向新轨道的思想文化	223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中断	231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的起源	231
一、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	231
二、“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243
三、对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的批判	250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急速确立	260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260
二、“三大改造”的急促推进	274
结语	284

导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到今天，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回想六十多年前的10月1日下午，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立刻传遍了北京城，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从这一时刻起，中华民族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共和国不会忘记，从这一天起，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军事制度；实行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制度。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人民，人民的范畴兼容而宽泛，并共同享有各项基本的政治权利。

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为己任的中国革命，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热情和献身精神。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生产力挣脱三座大山长期束缚的枷锁，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潜能和活力，并很快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初步巩固的物质基础。

然而，曾几何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然演进失去了准确的历史方位，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出现了滑轨，经济关系大变革的迅即到来很快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嬗变，来自最高权威方面的历史判断将这一牵动全国几亿人口的大变革时期，称之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也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民主秩序”，一个活生生的社会阶段被人为地割断了，亿万人民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被扭曲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富有历史真实感和普遍号召力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甚至成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社会阶段，其社会性质、社会特征、社会政策和社会生活长期被误判、扭曲、抛弃乃至遗忘。

直到 1978 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古老的中国开始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恢复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提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

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重新制定,触动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学术界开始反思建国初期的那段历史,反思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反思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

1988 年 5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龚育之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书。该书是龚育之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所做的几篇文章和答记者问的合集。在这几篇文章中,龚育之谈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但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角度出发来谈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因此书中虽然提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并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论述。

我于 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届全国统考的大学生,硕士毕业后,1985 至 1988 年期间,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胡华是当时全国中共党史学科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其所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在 1950 年 3 月正式出版后,连续发行 13 版(次),发行达数百万册,有日本、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的译本,在海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由他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发行达数十万册,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所得版税收入,由胡华提议以三人名义——另两人为他的学生(协助编写者)戴逸(现为清史编撰工程的首席专家)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与彦奇同志，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飞机。

我当年跟随胡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博士论文写作的需要，研读了大量原始的文献资料，发现中共党史上，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的领袖人物，还是建国前夕中共所召开的重要会议，除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大量论述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有大量的论述和完整、系统的设想，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各种中共党史书籍却无人提及，甚至可以说是讳莫如深。

学术界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带着这个疑问，当时还是一名博士生的我请教了导师胡华教授。胡华教授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人们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不敢涉及和研究，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极“左”政治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年代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提倡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为资本主义翻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倡宣扬新民主主义甚至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重新肯定了“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听了胡老师的一席话，我萌发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以此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我当即征求胡老师的意见。胡老师思索了片刻后肯定了我的想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选题，不论在对学术界的理论贡献上，还是在对当时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新颖、学术界当时还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题。

在受到导师的肯定后，我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工作。当时因为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大量的档案文献都没有公开出版，例如，关于毛泽东的材料主要的就是一套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像今天在市面上已经十分常见的《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当时还没有出版面

世。做历史研究,没有档案材料的支撑是绝对不行的,为了能够取得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把铺盖卷搬进了中央档案馆,开始认真查阅档案材料。当时复印机、打印机这些东西对一个普通的博士生来说还是十分稀有和昂贵的东西,且中央档案文献也不允许复印,查阅和记录档案材料只能靠手工。当时我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要在其中选择出对自己有用的一部分就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材料选出以后,还要对材料进行逐条的摘记和核对,这就更是一件辛苦活,当年的我就靠着自己手中的笔和稿纸,抄来了中央档案馆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大量文献。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1986年下半年,我带着摞起来有一米多高手抄的档案材料回到了人民大学,开始着手准备论文的写作。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努力,到了1987年底,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初稿。

但此时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了,我敬爱的导师胡华教授因为身患癌症,不幸辞世,他病重期间还一直不断肯定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并对我当面交代:“你一定要把论文写好。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从小离家,1938年参加革命,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我有三大遗愿没有完成:一是《中共党史人物传记》没有编完;二是想写一部《中国现代史(简本)》的书;三是没有把你们几个博士生带完。”多么可敬的导师,在他弥留之际,心里想的还是学生的论文和学业。在胡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感人精神的鼓舞下,我于1988年初,完成了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与巩固的历史考察》,并圆满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论文中我指出: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还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本论文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问题。

我毕业后,1990年与庞松合作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并再版五次,供不应求。这本书在结构上共分为七章,其主要内容是从社会发展的大视角,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途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忠实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

的中国特色，它有政治结构上的宽泛性、经济结构上的多样性、文化结构上的兼容性、社会结构上的过渡性；以及对于更高社会阶段，它的不可逾越性、相对独立或完整性，使共和国的童年充满活力和生机。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和必由之路。本书还着重描述了短短几年内，年轻共和国滑轨、嬗变的全过程，剖析了在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突变和超越代替了渐进的社会发展法则，使共和国脱出了正常轨迹，乃至发生了缺乏物质基础的嬗变的源起，以及给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来长期的阵痛和后遗症。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冷静的反思、精辟的论证，引出了任何社会自然发展阶段都是不可人为超越的深刻历史教训，并呼吁找回失去的选择，以利于社会的发展。

这本书和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山雨欲来风满楼——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张占斌的《“三家村”沉冤》，孙启泰、熊志勇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谢益显的《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以及钟朋荣的《十年经济改革——历史·现状·问题·出路》并列为“四十年国是反思丛书”（第一辑），当时在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96年7月号的《明镜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假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能够延续二十年——一本书所总结的重要历史教训》的文章，作者在这里提到的“一本书”指的就是《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这本书。文章的作者在开头说：

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假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能够延续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然后再视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许现时中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至少不至于弄成像现在这样的“不合格”。当然历史不可能假设，只能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其经验教训。最近去中国大陆在友人处借读了一本书，书名为《滑轨与嬗变》（副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作者是两位青年学者（庞松、王东）。这本书正是总结中国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教训。而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有关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

中却避而不谈，其实它对于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所经历过的挫折是十分有益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回避历史教训是不可取的。因此笔者愿就此书的内容向读者略作介绍。

接着作者用“短命的历史阶段”、“为何短命而亡”、“‘左’害经济失人心”、“短命而亡的后果”、“记取历史的教训”几个部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书的内容。尽管该文作者引用该书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和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值得商榷，但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这本书和这个问题在海内外的影响。

由此可见，早在 1985 年底时，胡华教授和我在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实包含着两个部分的重要内容，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我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的成果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共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引起了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命题不断的反思和更加深入的探讨。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共党史研究日益趋向学术化，再加上中共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更为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不少学者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更加重视，对其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成为一大热点问题，学术界随之掀起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潮。

1988 年 11 月，为纪念刘少奇诞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共同举办“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的于光远同志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则

要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问题。尽管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两者的任务和理论侧重点不同，应该加以区别。

1991年5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同志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书中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时指出：“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有人说，这个理论只适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不然，它也包含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薄一波以中共高层领导人、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肯定。

199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同志的《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该书其实是于光远在1988年刘少奇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和即席发言的一个合集，包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1988年11月25日在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两篇文章。作者思路独特，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但作者在书的自叙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我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我认为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即关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论。”于光远同志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以前学术界没有多少人作出这样明确地概括和区分，但是于光远同志不知道在此之前，胡华老师和我，两代中共党史专业的学人从1985年开始已经对这两大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我1988年6月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公开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个命题。不用说一部20余万字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博士论文和单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概念有何区别，就单从时间上来看，我的博士论文公开答辩并获得通过是在1988年6月，我和庞松联合署名的书籍出版在1990年。于光远以研究经济学为主，可能不

知道也没想到党史学界已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研究,写了博士论文并出版了专著。

2005 年 12 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一书,本书以于光远在 1988 年 11 月刘少奇诞辰 9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为基本内容,由党史学者韩钢加以诠注,韩钢的诠注虽然丰富了于光远原本十分简单的大纲,也更加便于人们理解,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但本书的特约编辑在编辑前记里面却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于光远先生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的一个新概括。以往,理论界、学术界从未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只是把新民主主义理论理解为革命理论。1988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联合召开的‘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光远先生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两个组成部分,除了‘革命论’外,还有一个‘社会论’。”这位特约编辑对党史学界以前的研究成果也许真的一无所知,于光远还只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个名词是自己的一个创造,并没有说以前学术界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大家知道“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在 1988 年 11 月召开的,书中却误作“1988 年 1 月”。

编辑这样说或许不熟悉党史专业而情有可原,学者韩钢在这本书的第 10 页到第 11 页的诠注里也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两个概念,都是于光远提出来的。”这样的说法至少是不够严谨。因为于光远也不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创立的,胡华和其他老一辈党史工作者都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而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涵,我在 1988 年 6 月的博士论文中也作出了系统的阐述。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都不能说于光远是单独提出这两个理论的第一人。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新认识和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与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紧密相连,也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同于一般性的理论,它是共和国历史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一些学术大家之间，出现了泾渭分明的观点，还涉及政治立场和人的品德的层面，这在中国学术界实为罕见。并且这种争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削弱，反而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学术界不断激起新的浪花。其中最早的一次影响较大的争论是在胡绳和沙健孙之间展开的。

199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联合举办的“毛泽东、邓小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胡绳同志抱病参加会议。会议的主办方也知道胡绳同志的身体不好，请他来的目的也只是让老先生随便讲一讲。没想到胡绳同志在会上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题目就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并由此引起党史学界一场争论。

1999年《真理的追求》杂志第3期发表了沙健孙同志题为《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对胡绳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评：

胡绳同志在自己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反对了民粹主义。这是合乎事实的。但胡绳同志同时又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并且把毛泽东关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个论断，说成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

毛泽东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领导了以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再次强调：



1485974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在《介绍合作社》这篇文章中，当他讲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想以此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个观点，这同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历史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后，德国超过它了。英国人到美洲殖民时，美洲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而后来美国不但超过了英国，也超过了德国。“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把当时已经达到的先进技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需要重复以往技术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步骤。胡乔木在 1983 年 5 月 14 日同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对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就作出过这种阐释，并且曾经在肯定的意义上加以引用。他指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可以发展最新、最现代的科学教育事业。”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这样一个历史规律。这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断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过，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7 页）我认为，为了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庸俗生产力论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